



2025年1月13日
星期一

第2197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 理论网: <https://www.cntheory.com>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37 代号: 1-267

重要言论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决不允许搞“七个有之”，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90年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遵义会议具有的历史地位、历史内涵和历史启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作出了郑重的结论。

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可以看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肯定了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每个历史决议所阐述的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这反映了我们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认识判断的不断深化。这集中体现在对毛泽东历史贡献的认识上：从“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再到“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由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业就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作是一个酝酿、发展和

完善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酝酿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

遵义会议召开前的酝酿过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党和红军历经多年建立起来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全部丢失。湘江战役一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更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党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不同思想、观点、意见开始交锋，为遵义会议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通道会议。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通道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但为促进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转兵创造了条件。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

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

猴场会议后，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此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and 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下转6版）

从古田到延安的淬炼之路

□ 张钧

一脉相承的思想改造

改造客观世界必先改造主观世界。在革命实践中，共产党人总是先改造自己、改造主观，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面临分裂溃散甚至变色的危急关头，为纠正党内和军队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化等错误倾向，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透彻析争本质，力挽狂澜，扶危定倾，立场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定型于古田会议。10余年后，为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拉开了延安整风大幕，使全党经历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时代以来，习主席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着眼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先后的古田、延安亲自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深入思考人民军队面临的考验之巨、思想的突围之难、身上的积弊之痛，并以革命性的淬炼步步深入、除患去病，进行全方位思想重塑，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彰显思想改造的威力与成效，开启了政治建军新征程。

从古田到延安，人民军队的凤凰涅槃、淬炼新生，总是先从彻底的思想改造开始的。知史以明鉴。对于军队来讲，思想改造愈有力，战斗力、凝聚力才能愈强大。

思想改造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深化理论滋养、淬炼政治灵魂是首要之举。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扭住学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突出“靶向式”“反思式”“案例式”学习，同时改进学习考评方式，变单纯的知识常识考核为思想政治素养的综合考察，既听其言、观其行，更读其心、查其绩，真正看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心入脑了没有、进入灵魂改造思想了没有、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了没有，确保理论贯注的深度实感。

思想改造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加强是非辨析、做到正本清源是关键之招。聚焦习主席指出的当前政治建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打好是非辨析、问题查摆和思想清理组合拳，在不断检视整改中把内心深处的小我私我挖出来、把藏在潜意识里的“毒素”清除掉，进一步强化对根本问题的认知、对根本原则的坚守、对根本界限的把握，真正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官德人品全面正过来、牢牢立起来。

思想改造是以知促行、以行践知的过程，强化知行合一、坚持笃行见效是务实之策。坚持把思想改造与日常工作、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联系起来，既注重解决好思想根子上的问题，也注重结合实际去纠、对接实践去改，把提升备战打仗能力作为检验质效的硬指标，把破解部队发展难题作为衡量好坏的硬标准，把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作为评估成果的硬要求，从一件件具体事做起、从一个个具体问题改起，切实把思想改造的成效落细落小落实。

（下转7版）



让正能量与大流量双向奔赴

□ 王庆杰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抓好改革舆论引导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要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大流量澎湃正能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环境。

正能量必须形成大流量，才有到达率、影响力。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的。离开人，宣传思想工作就会失去意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化”人需先“到”人。无论是新闻报道、文艺作品，还是各类文化产品，只有到达受众，才能呈现、展示，才能让人们去感知、去体会、去接受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和情理。没有流量，就没有受众，就只是自说自话，犹如空场中的表演、空谷中的呐喊，用尽力气只换来渺渺回声，不仅是无

力的，更是无效的。

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必须坚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一是以理服人。党的创新理论是正能量之核，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讲清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让人们品味到“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增进对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的自觉认同。二是以文化人。宣传思想工作无论以何种载体、何种方式呈现，其灵魂都是文化。以文化人，要坚持在传承创新中赓续文化根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使宣传报道、文艺创作、文化产品等在强其魂中塑其形、增其效，更加富有内涵、更加生动活泼，既有意义又有趣思，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让更多人去感悟、受影响，达到成风化人的效果。三是以情感人。共情才能共鸣，接地气才能聚人气，直抵人心才能赢得人心。理论宣传、新

闻报道、文艺创作都要避免简单化套路化，要胸怀同理心，主动向生活贴近、与大众融情，用朴素平实的话语、通俗易懂的表达、平凡温暖的故事去触动心灵，在具象化、生活化的传播中激荡人心，让更多人感同身受、形成共鸣，主动融入、分享参与，汇聚传播向上向善的力量。

人在哪里，流量就在哪里，阵地就在哪里。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其中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95.5%。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就要落实“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重要要求，努力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正面声音的最大增量。一是主力军要挺进主阵地，以互联网思维推进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全方位创新，用好从传统媒体到网络空间的全媒体舆论场，涵养、传播、充盈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二是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

的主体作用，主动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创造活力持续迸发，形成生生不息、绵延繁盛的不竭动力。严格各类新兴媒体和传播平台的监督管理，引导自媒体创作者积极弘扬新风正气，从微视角看新时代、用小故事讲大道理、从凡人小事中映射伟大变革，在大流量中澎湃磅礴正能量。三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把正确导向，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要旗帜鲜明，推动各级党组织把严格负面管控与加强正面建设结合起来，注重用正能量激励人、鼓舞人、引领人，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文化业态的深刻变化，迫切需要能承载正能量的大流量、能推动大流量传播的正能量，我们必须拥抱变革、向新而行，实现正能量与大流量双向奔赴，以汇聚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